

梁启超旧体诗与金泽荣汉诗比较研究*

— 以“沉郁顿挫”为中心 —

金贤珠** · 王成志***

<目次>

I. 绪论	IV. “沉郁顿挫”与律诗体裁
II. 情思“沉郁”的表现	V. 结论
III. “沉郁顿挫”与含蓄蕴藉	

I. 绪论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其在政治界和思想界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其旧体诗至今却未受到学界重视,甚至屡遭诟病。实际上,梁启超旧体诗产量丰富,共183题424首。1)钱仲联言其诗“天骨开张,才情横溢”。2)1923年,陈衍在编纂《近代诗钞》时,也以“录其尤雅者”3)之标准,选录梁启超旧体诗20首。金泽荣(1850~1927)出生于朝鲜王朝末期,曾与张謇、俞樾、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

* 이 논문은 2021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NRF-2021S1A5C2A02086852).

이 논문은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2023년 연구비지원에 의거하여 연구되었음.

**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중국어통번역학과 교수 : 제1저자

***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일반대학원 중어중문학과 박사수료생 : 제2저자

1) 汪松涛, 《梁启超诗词全注》,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 中山大学中文系,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116页.

3) 陈衍, 《近代诗钞·序》,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物都有一定程度的交游往来。金泽荣的汉诗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俞樾曾对其评价：“吾于东国诗文，亦尝略窥一二，如君者，殆东人之超群绝伦者乎。”⁴⁾ 李建昌云：“欲以自拔于萎靡肤率之患，则不读韶濩子之诗，而不可能也。”⁵⁾ 梁启超与金泽荣的生活背景和人生历程都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20世纪末的中韩两国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韩国则在1910年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在此社会背景下，梁启超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而金泽荣也不屈服日本的殖民统治，1905年开始流亡中国。另外，两人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交流。1914年，梁启超曾为金泽荣《丽韩十家文钞》作序。1922年，梁启超应张謇之邀来南通参加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时金泽荣已72岁高龄，仍亲往拜访梁启超，并作有《梁任公至南通余访见之明日有赠》一诗。

梁启超的旧体诗和金泽荣的汉诗都曾受“杜诗”的影响。康有为作为梁启超的老师，曾多次劝说梁启超“学杜”，如1910年7月21日便曾去信梁启超云：“何不学杜而师其瘦硬，尚与山谷同师也。”⁶⁾而具体到梁启超的旧体诗，康有为则屡有少陵之比。⁷⁾梁鉴江也说：“梁启超的律诗刚劲雄苍，风格与杜甫相近。”⁸⁾金泽荣的汉诗创作也深受杜甫影响，他曾有言，自己“于诗，好李白、杜甫、昌黎、东坡，下至王世正”⁹⁾。此外，金泽荣更是在其汉诗中表现出鲜明的“好杜”倾向，或化用杜甫诗句：“古篋哀妍赋，荒江窳窳桥”(《次韵朴石堂子山》)化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河梁幸未拆，枝撑声窸窣”一句；“今宵成一宿，真不唾青城”(《居昌龙山亭》)化用杜甫《丈人山》中的“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或将与杜甫相关联之内容入诗：“千人倒退公孙舞，三日摩挲索靖碑”(《题紫霞申公墨竹》)，将与杜甫有关的典故

4) 김택영, 《소호당집》(제1권), 파주: 점필재, 2020, 40쪽.

5)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6권), 서울: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628쪽.

6) 康有为, 《康有为全集》(第九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149页.

7) 梁启超, 《梁任公诗稿手迹》,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8) 汪松涛, 《梁启超诗词全注》,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4页.

9)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2권), 서울: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698쪽.

入诗；“翩僊转世奎仙子，寂寞哀时杜草堂”(《寄黄梅泉》)则将杜甫住所名入诗。不难看出，杜甫其人其诗都对相似时代的中韩两位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的旧体诗和金泽荣的汉诗因受到“杜诗”影响，而表现出“沉郁顿挫”之风貌。“沉郁顿挫”乃“杜诗”主导风格，这在文学史中已成定论，因此本文不再赘述。文学批评领域，屡有学者将后世人的诗词比附“杜诗”，北宋黄裳在其《演山集》中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¹⁰⁾，赞赏柳永词能够反映时事，并将其与“杜诗”并列。清人邵瑞彭则看到了周邦彦对词律的重视，并将其与杜甫的律诗并提，邵瑞彭曾在《周词订律考》中说：“尝谓词家有美成，犹诗家有少陵，诗律莫细乎杜，词律亦莫细乎周。”¹¹⁾上述论者或从思想内容层面比附杜诗，或从艺术技巧层面比附杜诗，而从两方面同时呈现少陵“沉郁顿挫”之风貌者，当属梁启超和金泽荣。关于“沉郁顿挫”之具体内涵，清人吴瞻泰有云：“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¹²⁾今人吴小如也说：“‘沉郁’偏重指思想内涵。‘沉’者，深也，‘郁’是凝聚的意思。杜诗有思想性，不仅有深度，而且有力度，说服力强，内在蕴涵意义深厚。”“‘顿挫’应该指语法、句法，或写作上的层次。这是说写作技巧、艺术方面的问题。‘顿挫’是一层意思深似一层，有转折。”¹³⁾由此可知，“沉郁顿挫”四字实则高度概括了“杜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两方面的特征。

本文将以梁启超的旧体诗和金泽荣的汉诗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历史研究、对比阅读和平行研究等研究方法，平行研究是把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类别、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方面实际存在的类同和差异都作为可进行研究的主题，可比性是进行平行研究的重要前提，所谓的可比性便是指比较的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以进行比较的基础，这个

10) 纪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 邵瑞彭，《周词订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136页。

12) 吴瞻泰，《杜诗提要》，合肥：黄山书社，2015，5-6页。

13) 吴小如，《吴小如讲杜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44页。

基础就是比较对象之间的异同点。¹⁴⁾本文将使用以上研究方法，从“沉郁顿挫”这一角度切入，先从思想内容层面比较论述两者诗歌“沉郁”的具体表现，以及这种表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继而从艺术层面探讨二者“沉郁顿挫”风貌形成的艺术技巧上的异同。本论文具有以下学术价值：首先，可以考察二者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何样的继承和接受；其次，可以分析二者诗歌中所体现出的特定时期的文人心理；再次，可以揭示同样处于列强侵略的时代苦痛中，以梁启超和金泽荣为代表的中韩两国诗人是如何通过诗歌来完成对这段历史的表达；最后，以梁启超和金泽荣两位诗人的诗歌作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可以通过文学的视角透视两国之间互为唇齿的密切关系，从而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和文学交流。

II. 情思“沉郁”的表现

吴瞻泰所言“沉郁者，意也”中的“意”实则包含了思想和情感两个维度的内容，且二者共同造成“杜诗”深沉的意境和沉郁的风格。乔象钟也有相似之观点，他指出，杜甫诗歌沉郁的风格，主要表现了“杜诗”思想内容的博大深厚，生活体验的丰富真切，感情的饱满有力。¹⁵⁾由此可知，“沉郁”主要是思想内容层面的概念，它表现为思想和情感，即情思的厚重深沉。

梁启超生逢清末乱世，清政府极度腐败，保守落后，且不思进取；八国联军侵华，又使民族危机空前加重。此时的韩国更是动荡更迭，自1875年，日军打开朝鲜王国国门，韩国先后经历了朝鲜末期，大韩帝国时期，以及长达35年的日据时期。梁启超和金泽荣作为家国动荡的历史亲证者，情思厚重沉郁，遂以诗歌抒之。这种沉郁情思，在二者诗歌中的共同表现便是爱国之情与忧国之志。梁启超说：“吾之国也，吾爱之，不能坐视其亡而不救也。”¹⁶⁾

14) 金哲, 《当代新方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110页。

15) 乔象钟, 《唐代文学史》,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515页。

梁鉴江也指出：“梁启超的诗洋溢着炽烈的爱国激情，无论写景感怀、赠友送别，都饱蕴家国之思。”¹⁷⁾《铁血》一诗便是通过唐才常等维新人士遇难，王权败落，后党专政等史实的描写，抒发了海外流亡者对故国的爱与忧。《秋夜》则以李鸿章代表清廷签署《辛丑条约》的史实为背景，通过“秋夜”“落叶”“笛声”“寒灯”“黄月”等凄冷意象，表现了诗人对国家政局的担忧。下面以《书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韵》(其一)为例作具体论证，诗云：

青史古多不平事，
修门今有未招魂。
西风易送残年尽，
东市难为直道存。
王气欲沉山鬼啸，
女权无限井蛙尊。
瀛台一拘维新泪，
愁向斜阳望国门。¹⁸⁾

本诗不仅表现了诗人对后党专政的痛恨，还抒发了爱国之情与忧国之志。首联中的“修门”是指战国时楚都郢的城门，这里代指京都，“未招魂”即冤魂之意。首联以古照今，古今互映，使全诗起句便给人沉郁厚重之感。颌联是对首联中“不平事”的具体解释。“西风”暗指慈禧太后，而“东市”是汉代处决罪犯的地方，因此后世便以东市代指刑场，“直道”意即正义与真理。此句是对维新人士唐才常等二十一人因反对西太后，主张维新变法而遇难史实的反映。颈联是对当下政局的描写，“山鬼”和“井蛙”都是暗喻后党一派，“王气”则指光绪帝的王权。全句意即帝王之权完全丧失，政权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所操纵。比喻和对比修辞手法的运用，烘托了时局形势的紧张感，从而表现了诗人对国家政局的强烈担忧。尾联中的“瀛台”是戊戌变法后光绪

16)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27页。

17) 汪松涛，《梁启超诗词全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页。

18)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420页。

帝被囚之地，“维新泪”曲折地表现戊戌变法的失败，而一个“愁”字便将诗人对后党专权的痛恨之情，维新变法失败的愤怒之情，以及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时局的担忧之情全部抒发出来，情思的深刻复杂使此诗极为厚重沉郁！此类诗歌还有《赠别郑秋藩，兼谢惠画》《留别澳洲诸同志》(其一)《将去澳洲留别陈寿》(其二)等。

金泽荣的汉诗也表现了其流亡中国时强烈的爱国之情与忧国之志。为了保存韩国文化的精粹，维系和发扬民族精神，他在流亡中国期间，一方面将精力用于编写韩国历史，其先后编撰并印行《韩国历代小史》(二十八卷)、《校正三国史记》(五十卷)、《新高丽史》(五十三卷)、《韩史纂》(六卷)、《高丽季氏忠臣逸事传》(一卷)等。另外，除了编撰史籍外，金泽荣还整理并出版了若干有关韩国文化和文学的书籍，如《丽韩十家文钞》(十一卷)、《梅泉集》(七卷)、《重编朴燕岩先生文集》(七卷)、《崧阳耆旧诗集》(二卷)、《古本大学私笺》(六卷)等。金泽荣在《明美堂集序》中说：“自古人未尝不亡，而于亡之中，有不尽亡者，其文献也。”¹⁹⁾正是对故土深沉的热爱才使得他如此注重故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对国家的爱与忧在其汉诗中也得到体现。1905年，56岁的金泽荣怀着“与其老作岛儿之奴，毋宁作苏浙寓民”²⁰⁾的决心，踏上了亡命中国之路。走上流亡之路前，诗人因忧国之情而频频回望故国。在《九日发船作二首》中，他写到：“东来杀气肆阴奸，谋国何人济此艰。落日浮云千里色，几回回首望三山。”于发船前诗人的形貌中，我们不仅读出了对故土的留恋，这其中更包含了爱国忧国之情。再来看这首《寄黄梅泉》(其三)，诗云：

小史经营胜泪痕，
邱明群籍载西辕。
愧无身手关时运，
只有文章报国恩。

19)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1권), 서울 :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524쪽.

20) 황현, 《매천야록》, 서울 : 문사, 1994, 178쪽.

冽水幸曾窥皱面，
江海今又映离魂。
此生壹郁将谁语，
好向浮云数寄言。²¹⁾

本诗中的黄梅泉即黄玗(1855~1910)，字云卿，号梅泉，韩国长水人。1910年，《韩日并吞条约》签订后，大韩帝国灭亡。黄玗得知此消息后，为抵抗日本的统治，留下绝命诗，自杀殉国。

本诗首联言经历，“小史”即金泽荣所著《韩国历代小史》，1914年创作完成。诗人为了创作此书，曾于1909年由中国淮南前往韩国搜集资料，他在本书的序言中说到：“及己酉，自淮南暂往韩，得高句丽广开土王碑及日本史所载渤海国事以归，而明年韩亡矣。”²²⁾诗人借左丘明搜集珍存列国史料，完成《国语》的典故，来暗喻此事；颌联言抱负，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心。诗人因不能像抗日烈士一样亲自出战杀敌而深感惭愧，于是他决定以“文章报国”；颈联言情思，幸亏汉江的水曾映照出长满皱纹的脸，江边的梅花又显现出你离去的魂魄，悲凉的言语中充满对故人的怀思；尾联言心理，诗人感慨友人离去后，还能向谁倾诉对故国政局的担忧呢？全诗情思杂糅，感情深厚浓郁，读之感人心脾！此类表达金泽荣爱国与忧国的诗歌还有《寄朴茂原》、《送洪舜俞郑景施金国珣三君之南京》等。

梁启超自从以政治改良家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便轰轰烈烈地开展一些列的政治改良运动，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叱咤风云。由“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再到“护国运动”，他都亲历其中。这些改良运动似乎都预示着梁启超的平生抱负可尽情施展，但实际上却屡屡受挫，举步维艰。正因如此，他的旧体诗常将忧国之情与壮志难酬的悲愤等交织缠绕于同一首诗中，进而使诗歌情思沉郁，且带有悲壮色彩。试看《东归感怀》一诗，诗云：

21)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1권), 서울 :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288쪽.

22)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3권), 서울 :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5-12쪽.

极目中原暮色深，
蹉跎负尽百年心。
那将涕泪三千斛，
换的头颅十万金。
鹃拜故林魂寂寞，
鹤归华表气萧森。
恩仇稠叠盈怀抱，
抚髀空吟《梁父吟》。²³⁾

本诗作于1900年6月，时作者应国内维新志士唐才常等电召，由檀香山匆忙归国。首联写自身遭遇和现今处境，“暮色深”三字是对当时黑暗政局的书写，同时也侧面表现出诗人对时局的担忧，“蹉跎”又将平生志愿被辜负的无奈和悲愤写尽。颔联则是对“负尽”之原因的解釋。光绪二十五年，清廷发布了《缉拿康梁上谕》，缉捕令上表示无论何人，凡是能将康有为和梁启超缉拿归案者，赏银十万两。“涕泪”在这里是指诗人的忧国之泪，因此本句意即，无奈自己的满腔忧国热情，最终只化为了黄银十万两，爱国之心被辜负的无奈充斥于字里行间。颈联由书写被辜负的无奈转而表现思归之情。“鹃”指“杜鹃”，传说蜀国皇帝死后便化为杜鹃，“故林”便是指故国，《搜神记》中有白鹤归来，于华表之上歌唱的记录，后人便用“辽东归鹤”来比喻人久别返回故里。本联化用这一典故，表现了自己对故土的思归之情。尾联中的“抚髀”一词化用《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中刘备向刘表哭诉日月飞驰，功业不建的无奈这一典故。《梁父吟》为齐地古风，多抒发悲凉慷慨之情感，后人多以《梁父吟》比喻壮志难酬、英雄挽歌的悲哀。因此，尾联诗人由颈联的思归之情转向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哀。

纵观全诗，诗人将对自身处境的哀叹，对故国的爱与忧，以及壮志难酬的悲愤等多重情感一吐而出，从而使本诗情思沉郁复杂，因此汪松涛言此诗“苍凉沉郁”²⁴⁾。此类诗歌还有七律《累夜梦仲弟对酌故园湖楼中，歆歆国

23)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420页。

24) 汪松涛，《梁启超诗词全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59页。

事，继以涕泪，旋相将作少时憨嬉状，哀乐无端，不知其何朕也。辄赋二章奉寄》二首。本组诗从梦境起兴，继写自己儿时的快乐时光，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儿时之乐与今日之时局两相对比，不免悲从中来。通过此诗，梁启超一方面抒发思乡之情，同时又悲叹自己空有一腔壮志，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情思亦沉郁苍凉。

1905年10月，日本迫使大韩帝国政府签署了《乙巳勒约》，这一事件标志着韩国外交权利的丧失，并沦为日本保护国。而日本的欲望并未止于此，1910年8月，日本又迫使纯宗签署《韩日并吞条约》，至此朝鲜半岛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此背景下，金泽荣的汉诗在抒发对故国的爱与忧之外，他还将对侵略者的愤恨和对故国沦陷的无奈融于诗中，进而使全诗情思浓郁深厚。如《寄郑葵园(其一)》便是此类代表，诗云：

珊珊诗骨郑三郎，
手把霜戈睨我墙。
好屈后山为弟子，
真如南粤作君王。
我作辽东丁令威，
南溟君已返湘累。
如何雪涕相看日，
又是江山破碎时。²⁵⁾

郑葵园即郑丙朝(1863~1945)，字宽卿，号葵园，韩国东莱人。1896年，因明成皇后被害事件被流放济州岛，1907年，以特使的身份解除流放。

首联是说郑葵园时常与金泽荣切磋诗艺，并且其有着如佩玉一般的诗骨。颌联运用两则典故转向对郑葵园虚怀若谷品质的描写。“后山”即后山居士陈师道，陈师道曾从师黄庭坚，两人相互推崇，后陈师道发现黄庭坚的诗过于出奇，遂转师杜甫，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南粤”指的是汉代南越王赵

25)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1권), 서울 :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283-284쪽.

佗。秦朝灭亡后，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号称“南越武王”。后汉高祖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并劝说赵佗与大汉修好，经陆贾的劝说，赵佗臣服汉朝，成为了汉朝的藩属国。与这两则典故相关联的是，郑葵园也长于作诗，却能降低姿态，向金泽荣学习。因此，诗人以陈师道和赵佗比附郑葵园，从而表现了对郑葵园谦卑好学，虚怀若谷品质的赞许。颈联是对诗人自己的描写，“辽东丁令威”典出《搜神后记》，辽东人丁令威成为神仙，千年以后，变为白鹤回归故里，而一名少年持弓欲射杀此白鹤，因此白鹤叹息徘徊后离去。这一典故的使用意在自嘲自己在亡命中国后，想要回归故国却不能的无奈处境。“南溟”句是对郑葵园被特赦的反映。尾联使本诗的情感达到高潮。与久别的故人重逢本应欣喜若狂，但诗人在经历了山河破碎后却只能与友人挥泪相对。前三联的层层铺垫，使沉积已久的情感在尾联得以释放，“又是江山破碎时”一句写尽诗人在面对山河破碎时的无奈之感！另外《伏闻皇上内禅感赋》一诗则通过对朝鲜高宗被迫退位这一史实的描写，表现了金泽荣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因故国主权丧失而产生的悲痛无奈之感。

Ⅲ. “沉郁顿挫”与含蓄蕴藉

“沉郁”是指思想内涵层面的，即情思的复杂厚重；“顿挫”则是指艺术技巧层面的，它是造成“沉郁顿挫”风格的手段和方法，具体而言则是指诗歌意脉需有转折，层次错落，且层层递进。而众所周知，手法是艺术的外壳，情感才是艺术的灵魂，艺术手法必然要服务于情感的表达。所以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亦或“沉郁”和“顿挫”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交相缠绕，断不可分裂而谈。因此，下文在重点讨论实现“沉郁顿挫”的艺术技巧时，将与思想内容相结合，如此方可真正实现“沉郁顿挫”。在梁启超的旧体诗和金泽荣的汉诗中，“沉郁顿挫”的实现一是得益于含蓄蕴藉艺术手法的使用，二是与律诗这一诗歌体裁有关。

含蓄蕴藉艺术手法一方面能够使诗歌情感浓缩沉淀,从而造成诗风的深沉厚重;另一方面,此手法实则是将情感进行曲折表达,这种曲折也必将导致诗歌结构意脉的层层转折和顿挫跌宕。“杜诗”便以含蓄见长,而受“杜诗”影响,梁启超和金泽荣也极为看重含蓄蕴藉的艺术表现法。梁启超曾有言:“向来写情感的,多半是以含蓄蕴藉为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儿,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²⁶⁾而金泽荣则提倡作诗要注重“神韵”,他所说的“神韵”并非是独创的新生概念,而是对“神韵说”进行受容的产物。²⁷⁾“神韵说”便要求“诗歌艺术应以简练的笔触、含蓄的意境,采取平淡、清远的风格,抒发主观内心的性情,使读者从中体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深意和美感”²⁸⁾。含蓄蕴藉作为诗歌艺术的表现技巧,包括多种方法,如虚实结合、对比、象征、用典等等。如若细读梁启超和金泽荣的诗歌便不难发现,二者都大量使用了虚实结合式的含蓄蕴藉手法。梁启超在《南海先生诗集》序言中写到:“诗者,言之有节文者耶!凡人情志郁于中,境遇交于外,境遇之交压也瑰异,则情志之郁积也深厚。情者阴也,境者阳也;情幽幽而相袭,境媿媿而相发。阴阳愈交迫,则愈变化而旁薄。”²⁹⁾虚与实的结合,情与景的交映,一方面使诗歌情感深沉厚重;另一方面也使意脉曲折往复,从而造成诗歌的跌宕顿挫。梁启超的《人日立春》便是此类代表,诗云:

渐老逢春易断肠,
天涯人日感流光。
浪传故事翹青幘,
默计何方寄草堂。
万劫莺花成久客,
三年弓剑泣先皇。

26)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208页。

27) 박수천, <창강 김택영의 「잡언」에 나타난 신운의 문학론>, 《한국한시연구》(25), 2017, 296쪽.

28) 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苏州: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72页。

29)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九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页。

玉盘丝菜无消息，
愁见东风绿海桑。³⁰⁾

本诗作于1911年，发表于当年的《国风报》第五期。本年人日恰逢立春时节，诗人念及光绪帝辞世三年，感叹异乡游子身似浮萍，时光流逝，功业无成，遂满目春愁，悲上心头。

首联为一层。“渐老”与“易断肠”言诗人之形容，写虚；“逢春”言当时之景，写实。虚实相生，以情穿景，抒发了时光易老，功业无成的悲慨。颔联“浪传”句承接首联首句，“青帻”即黑色束发带，这里比喻功业无成，地位卑微。正因如此，诗人曾无数次设想归隐乡间的草堂。颈联语意发生一层转变，并由单纯写情转向“以景写情”。“万劫”指极长的时间，“莺花”指黄莺和花朵，这里用“万劫莺花”指代春天，属景物描写，写实；“三年”句借用黄帝乘龙升天而堕其弓的典故，来表现诗人对光绪帝的怀念，属情感描写，写虚。尾联虽接续颈联的表现手法，但语意又发生转变。“玉盘”此处用来比喻圆而明的月亮，喻思亲之意；“丝菜”，化用莼鲈之思的典故，喻思乡之情。“东风绿海桑”属景物描写，而“愁”字便将时光流逝，功业无成的悲慨，对光绪帝的怀念，以及身在异乡，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等情感全部囊括其中，因而诗歌情感极为沉郁浓厚。另外，虚与实的交互穿插，情与景的转换与融合都使诗歌意脉结构层层顿挫。再如《庚戌岁暮感怀》一诗中的“岁云暮矣夜冥冥”为景色描写，属实写；“只应长醉不成醒”一句则是感情描写，属虚写。全诗通过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抒发了诗人因时光流逝却功业无成而产生的悲叹。又如《台北故城毁矣，留其四门》一诗中的“清角吹寒日又昏”一句亦是实写景物，而颈联“客心冷似秦时月”则是虚写心境。此诗亦是通过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道出了在面对台湾被日本强占，山河破碎的事实时的忧伤和无奈。

金泽荣汉诗表现出与梁启超旧体诗相同的倾向，其诗中也大量运用了虚实结合式的含蓄蕴藉手法，金泽荣有诗论：“高丽金状元黄元作两句，曰：‘长城一面溶溶水，大野东头点点头’。……自古诗之佳品，多在与虚实相配，如

30)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458页。

黄元此诗两句，皆实全无活趣，其何足为工哉？惟郑司谏知常‘别泪年年添绿波’一绝、金三渊昌翁‘杯行星汉流’一律，最为佳作。”³¹⁾通过这一诗论可以看出，金泽荣认为最上乘之诗应是虚实相配，情景相融之诗，而诗人在其汉诗创作中，也同样践行这一原则。试看《西湖》(其四)，诗云：

孤山处士出尘才，
妙咏园林半梅开。
怊怊梅花无主久，
春风岁岁为谁来。³²⁾

本诗乍看风格清新自然，内在却极具少陵“沉郁顿挫”之风。首联中的“孤山处士”是指林逋，他四十几岁时选择了隐居生活，常常驾舟往来于各大寺庙，拜访高僧。家中如有客至，童子便放鹤以告知，林逋见鹤便归。林逋种梅养鹤，终身不仕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号称“梅妻鹤子”。因此，金泽荣在这里用“出尘才”三字赞扬林逋超脱尘世的高尚情操。颌联继续对林逋进行刻画，“园林”是指林逋的七律《山园小梅》，林逋通过这组诗，重点刻画了梅花的高洁品质，并以梅花的品性暗喻自己孤高幽逸的不凡情趣。本诗首颌两联对林逋与梅花进行描写，表现两者品质的高洁，属虚写。下面吟咏对象和语意层次均发生转变。颈联表面虽亦在写梅，但已由虚入实，转向对现实西湖的梅花进行描写。诗人感叹，梅花已久无主人，春风又是为谁而年年吹拂呢？这里的梅花实际是诗人自喻，表现了流亡在外的自己无枝可栖、无家可归的悲伤情感。从颌联到颈联笔致的转换，颈联与尾联虚实结合，以情穿景手法的使用，以及诗人对流亡之悲的抒发都使本诗极富“沉郁顿挫”之美。

梁启超诗歌的“沉郁顿挫”还得益于象征式含蓄蕴藉手法的大量使用。象征手法通过事物的具体形象来表现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情感，这一手法的使

31)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2권), 서울 :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91쪽.

32)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1권), 서울 :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273쪽.

用可使诗文表情达意更为含蓄委婉，进而造成诗风的沉郁顿挫。如《次韵酬星洲寓公见怀二首，并示遯庵》便是此类作品，诗云：

万里投荒何日见，
九原不作与谁归。
酬君驼泪和鹃血，
老我蓉裳与芰衣。
漫有挥戈回夕照，
故应尝胆疗朝饥。
人间惜别徒多事，
迸澀于今遇壮飞。³³⁾

本诗作于1900年，全诗表达了诗人对民主政治的无限想往和投荒去国、壮志未酬的感慨。颌联中的“驼泪”“鹃血”“蓉裳”“芰衣”等都运用了象征手法。“驼泪”是指骆驼之泪，骆驼向来以坚忍不拔、负重前行而著称，因此这里的“驼泪”则象征着诗人对国家强烈的责任意识 and 身上肩负的救国重担。“鹃血”指杜鹃之血，传说杜鹃昼夜悲鸣，啼至血出乃止。这里的“鹃血”则象征着诗人对故国的无限深情。“蓉裳”和“芰衣”本出《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本表示品行的高洁，而“老我”句的意思为我这修洁之身也因忧国而逐渐衰老。因此，这里的“蓉裳”和“芰衣”则象征着诗人高洁的品性和忧国之情。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使全诗极为婉约含蓄，继而造成了表情的婉约曲折和情思的深沉浓郁。再如《奉酬星洲寓公见怀一首，次原韵》，诗云：

莽莽欧风卷亚雨，
棱棱侠魄裹儒魂。
田横迹遁心逾壮，
温雪神交道已存。
诗界有权行棒喝，

33)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421页。

中原无地著琴尊。
横流沧海非难渡，
欲向文殊叩法门。³⁴⁾

本诗亦作于1900年，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唐才常在汉口准备武装勤王。在此背景下，梁启超准备由檀香山经日本秘密回国。当他到达日本时，北京已被攻陷，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亡西安。而抵达上海时，自立军被镇压，唐才常等则遭到迫害。诗人在上海停留十日，便经香港前往新加坡，会晤康有为。此诗便作于梁启超前往新加坡前。

首联中的“风”和“雨”象征着当时国际形势的波谲云诡，变幻莫测。颌联中的“琴尊”意即琴和酒杯，这里指文人在宴会上弹琴和饮酒，进而象征和平安逸的生活环境。而“无地著琴尊”则暗示当时国际形势极为复杂动荡，已不存在任何的和平角落。尾联中的“横流沧海”亦使用象征手法，意即沧海横流，海水泛滥，这里象征世事的纷乱无常。象征手法的大量使用使本诗内蕴深厚，情感深厚沉郁。再如“偶嚼梅花耐冰雪，更因黄酒忆乡关”(《羯南湖村招饮上野之莺亭，以诗为令，强成一章》)中的“梅花”和“黄酒”分别象征着诗人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和对故土的思念之情。“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太平洋遇雨》)中的“风雷”本指太平洋上的风暴，这里则象征着时代的变革风雷。“忽起觚棱思，乡心到玉关”(《游箱根浴温泉作》)中的“觚棱”本指宫殿上转角处的方角形的瓦脊，“玉关”本指玉门关。而本诗中的“觚棱”和“玉关”则象征诗人对故国的怀念。总的来说，象征手法的运用使诗歌含蓄蕴藉的同时也造成了诗歌情感的厚重沉郁。

金泽荣诗歌的“沉郁顿挫”则还与典故的化用有关。众所周知，典故可以使诗歌生发出无限言外之意，使语义委婉而含蓄，从而使诗歌情感深厚沉郁；不仅如此，典故的运用还能贯通古今，强化诗歌的历史纵深感，使其在古与今的交互中更显顿挫跌宕。对于典故的使用，金泽荣有云：“七言诗句，长不用典，则易入于浅俚琐细。王子猷所云‘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

3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420页。

鬼’者，无从以见。若五言，不必多用典，多用典，则有何昭旷闲远之味乎？”³⁵⁾ 仔细研读其七言诗便不难发现，其中大量运用经史典故，或一诗一典，或一诗多典，如《和沈耻堂》，诗云：

楚楚人间沈隐侯，
百年书史一灯篝。
忽逢乱世将何适，
满把深情向我投。
王粲楼中春寂寂，
秦皇桥外海悠悠。
若为共访田横岛，
落日招魂痛饮休。³⁶⁾

沈耻堂即沈相福(1876~1951)，字景晦，号耻堂，籍贯韩国青松。他所处的时代动荡纷乱，但其却并未慨叹世道的纷乱萧条，而是竭尽全力阐明儒学的价值，本诗是金泽荣对沈耻堂的和诗。

“忽逢”句一方面点出了遭遇国破家亡的自己和友人在面对纷乱世道时的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两人情感无处寄托的无力与茫然。接着诗人又运用三则典故将其内心错综复杂的情感委婉而含蓄地刻画出来。第一则是王粲登楼的典故。“王粲楼”位于湖北省襄阳城，三国时期魏国的王粲为了躲避董卓叛乱而前往荆州依附刘表，却未受刘表重用。怀才不遇，身在异乡，因而他登上江陵的城楼作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和思念家乡之情。第二则是秦皇架石桥的典故。“秦皇桥”位于今山东省威海市，传说秦始皇为观海岸对面之风景而欲修建石桥，但因其未遵守与龙王的约定而触怒龙王，石桥遂未修建成功。第三则是田横五百士的典故。田横与其兄田儋、田荣本为齐国贵族，秦末时期，他们不满暴秦之统治而自立，占领齐地。后刘邦夺得天下，田横不满刘邦统治遂逃亡海岛，并最终自刎而亡，追随其逃至海岛的500多名

35)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2권), 서울 :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126-127쪽.

36)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1권), 서울 :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339-340쪽.

战士也最终自决，此岛便命名为田横岛。在日寇猖獗，故国沦陷的背景下，金泽荣通过这三则典故的使用，不仅表达了自己对故土的思归之情，而且也表现出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以及自己宁愿流亡海外也不屈服日本殖民的精神品质。典故的使用，使全诗在古与今的交映中，情思沉郁，意脉跌宕顿挫。此类作品在金泽荣的汉诗中比比皆是，再如《得王敬菴侍讲书喜赋》、《寄郑苏堪》、《金陵》、《寄啬翁》等。

IV. “沉郁顿挫”与律诗体裁

就艺术技巧层面而言，“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除了与含蓄蕴藉手法的使用相关外，还与律诗这一体裁本身的特点存在密切关系。“沉郁顿挫”是杜甫律诗的主导风格。管世铭有云：“七言律诗，至杜工部而曲尽其变。盖昔人多以自在流行出之，作者独加以沉郁顿挫。”³⁷⁾而造成杜甫律诗“沉郁顿挫”的原因则与律诗的特点有关，即律诗语言凝练，结构需起结传承，曲折变化。杜甫在律诗的创作中极其重视语言的凝练和意脉结构的层层递进。金启华认为，杜甫以丰富饱满的内容，纳入严格规律的形式，不仅写得凝练，而且充实有力，进而造成其五律沉郁顿挫的风格。³⁸⁾受“杜诗”之影响，梁启超和金泽荣也极其偏爱律诗这一体裁，语言的凝练和意脉的层层转换使他们的诗歌极具“沉郁顿挫”之风。

1910年7月16日，康有为去信梁启超，劝其习杜之律体，康有为于信中写到：“试熟读少陵律体百余，摹其神气格调、运典用笔之处。”³⁹⁾此事毋庸置疑会对梁启超产生一定影响。梁启超创作了不少五七言律诗，且极具少陵“沉郁顿挫”之风。康有为在评价梁启超的《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组诗时云：

37)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553页。

38) 金启华，《论杜诗的艺术风格》，《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1978，62页。

39)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九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8页。

“沉郁雄苍，合少陵《诸将》、《洞房》、《秦州》而治之，义正词严，上承‘小雅’，岂亏诗史！其详瞻亦前无古人。诗至此观止矣！”⁴⁰⁾这里康有为便对梁诗的“义正词严”给予高度评价。试看五律《朝鲜哀词》(其二十)，诗云：

地老天荒日，
图穷匕见时。
猿虫消并尽，
牛马应何辞。
涛咽仁川水，
云埋太极旗。
只应旧时月，
曾照汉官仪。⁴¹⁾

本诗作于1910年秋，本年朝鲜纯宗李坫在卖国贼总理大臣李完用等的操纵下，承认日本政府提出的《韩日并吞条约》，从此韩国完全失去自主权。得知此消息后，梁启超著文《朝鲜亡国之原因》《日本吞并朝鲜记》，以及《朝鲜哀词》组诗二十四首等，本诗便为组诗的第二十首。

本诗为首句不入韵，仄起式五言律诗，且格律极为严谨。首联主要写日本对侵略韩国蓄谋已久，“地老天荒”意即时间长久，而“图穷匕见”在这里暗指日本想要吞并韩国的狼子野心终于暴露。颌联语意层次发生转变，“猿虫”即猿鹤虫沙，比喻战死的将士，也指死于战乱的人。而“牛马”则指供人驱使，为人奔走的奴仆，诗人借此暗喻投靠日本的卖国贼。梁启超曾在《朝鲜哀词》(其十九)中的自注中写到：“合并之举，日人虽处心积虑已久，而发之者实为朝鲜之一进会。一进会者假政党之名欲以猎官者也。主之者为宋秉峻、李容九，会员十余万人，与现任内阁李完用一派不相能，献媚日本，欲取而代之……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辈是也。”本联运用比喻修辞手法，主要意在讽刺那些投靠敌国，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卖国小人。颈联照应首联，

40) 梁启超，《梁任公诗稿手迹》，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41)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451页。

语意也与首联相承，“涛”和“云”暗喻日本帝国主义，“仁川水”和“太极旗”借用与韩国密切相关的两则意象，指代韩国。“咽”和“埋”两动词则暗指日本吞并韩国的行为。尾联书写角度和语意层次均发生逆转，由写当下转而写过去。“汉官仪”本为东汉应劭所撰之书，用来记录西汉的官制，这里借指汉代中国官员的威仪。至此，诗人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对韩国亡国的同情，以及对前途的担忧等复杂情感，全部浓缩于此五言律诗中。全诗感情厚重沉郁，结构顿挫跌宕。再如五律《壮别》(其二十五)则为首句入韵，仄起式五言律诗。全诗既表达了诗人对邪恶阴暗的保守势力的愤恨，又表现了他对新世纪满怀的期待，同时也抒发了他对历史兴亡的无尽感叹，情感沉郁苍凉。此诗开合自如，章法曲折，在一开一合，一张一弛，一起一落中，生发出极其强烈的顿挫之感。此类诗歌还有七律《奉酬星洲寓公见怀一首，次原韵》、七律《书感四首，寄星洲寓公》等。

金泽荣亦偏爱律诗，并极为看重诗的格律和平仄等问题。俞樾曾言其诗“格律严整似唐人”⁴²⁾。金泽荣自己也曾在《杂言九》中有云：“古诗须善用平仄，调用之粘法，然后声调方协。如老杜诗‘弟侄何伤泪如雨’，若作‘弟侄何伤泪似雨’则不可；‘看射猛虎终残年’，若作‘看射猛虎送残年’则不可。”⁴³⁾另外，其在《杂言四》中亦有云：“诗最要调律，意趣虽好，律不协，则不得成其好。”⁴⁴⁾由此可见，金泽荣极其注重平仄、粘法等律诗的基本规则，而且他认为只有协律的诗才是好诗。正因如此，金泽荣在汉诗创作中大量采用律诗体。下面以七律《退翁六十寿诗》为例进行具体论证，诗云：

退翁生共菊花生，
骨节秋香鍊得成。
百里循声凌汉吏，
一州惇史似周更。

42)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1권), 서울: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7쪽.

43)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2권), 서울: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136-137쪽.

44)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2권), 서울: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119쪽.

投闲还有疲津叹，
惜老方深识者情。
满目鬓忧须暂置，
霞觴细与卯君倾。⁴⁵⁾

本诗格律严谨，为首句入韵，平起式七言律诗。诗中的“退翁”即张謇的兄长张謇，本诗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张謇高尚品德的赞美，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诗人深刻的忧国之情。

首联中的菊花这一意象象征着友人的高尚品性。菊花枯残后花瓣也不像其他花朵的花瓣一样直接凋落，所以人们常用菊花象征品性高洁。另外，菊花还代表着坚贞不屈和坚定顽强，故有诗“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朱淑真《黄花》)，“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杜甫《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等。诗人把对友人所有的溢美之词凝缩于“菊花”二字出之，使诗歌感情更为沉郁浓厚。颌联语意承接首联，继续对张謇进行描写，并且集中于对其名声的赞扬。“汉吏”即指汉代的循吏，而“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中的《循吏列传》，即奉公守法、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清廉官吏。“周更”指的是周朝的“三老五更”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主要是为了倡导以“孝”治国的社会风气。因此，颌联主要赞扬了张謇为官的清廉和个人品行的端正。颈联语意发生转换，由对友人的形象刻画转而抒发自己和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这份情感在两人都变老以后更显得厚重珍贵。试想如果本诗尾联以对朋友的描写和抒发友谊的珍贵而直接作结，那便无法使诗歌具有较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因此，诗歌意脉层次在尾联又突然发生转变，这也使本诗在情感沉郁的同时更为顿挫跌宕。“鬓忧”二字出自《左传》昭公24年：“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隕，为将及焉。”意思是寡妇不担心纬纱的数量少，而担心国家灭亡，最终殃及自己，后世便借此比喻忧国忘家的殷切。金泽荣在本诗中沿用此语的原意，表达自己满怀的忧国忧民之情。所以，此诗不再单单表达自己对朋友的赞美和对友情的看重，更含有对故国的担忧，情感沉郁，意脉顿

45)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1권), 서울 :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296-297쪽.

挫。再如七律《尹显泰同安昌浩李钟浩见访，遂与游狼山寺一宿》，诗云：

禅楼高凭彩云间，
花木香中梵诵闲。
万里怒涛江入海，
一声长啸月横山。
祖生击楫心能壮，
鲁子挥戈事正艰。
何日见君功业就，
春风歌舞返乡关。⁴⁶⁾

本诗亦为首句入韵，平起式七言律诗。首联是对狼山寺的景色描写，营造的是平和安静的环境氛围，属实写；而颔联营造的诗歌氛围突转，借用怒涛、江、海、月和山等意象，营造了宏大、壮阔而紧张的环境氛围，属虚写。另外，本联使用对偶和比喻的修辞手法，这里的“江”和“月”实际上是指尹显泰、安昌浩和李钟浩等为代表的韩国独立运动家，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使得韩国的民众怒发冲冠，“江入海”和“月横山”则暗示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越发壮大。从首联至颔联，环境氛围由实转虚，由平和转激壮，对偶和比喻修辞手法的运用又使诗歌情感沉郁，顿挫跌宕。颈联运用两则典故，承接颔联对独立运动家们的描写。第一则是祖逖击楫的典故。祖逖是东晋名将，他将恢复中原作为自己的使命，当他率领部队渡过长江时，中流击桨，誓死恢复中原。第二则是挥戈回日的典故。据说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厮杀极其激烈，天色渐晚，而周武王的部下鲁阳公愈战愈勇，他挥舞长矛，誓死战斗，最终全歼敌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后人便运用此典故比喻壮士力挽危局。金泽荣采用这两则典故，表现了独立运动家们不畏日敌，英勇反抗的英姿。尾联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对战斗取得胜利，恢复故国主权的希望和憧憬。

46)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제1권), 서울 :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292쪽.

V. 结论

梁启超和金泽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都选择了流亡他国之路，且二者都采用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民族情感和家国意识。梁启超的旧体诗和金泽荣的汉诗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上都受到了“杜诗”的影响，因而都表现出“沉郁顿挫”的特点。

内容方面，情感的浓郁厚重奠定了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基调，梁启超和金泽荣亦将流亡时期内心的爱国之情与忧国之志融于诗中，因而其诗表现出“沉郁”之特点。因梁启超的报国理想常被现实扼杀，因此他的旧体诗是壮志难酬的悲愤与爱国忧国之情交融的产物，其诗在“沉郁”的基础上更显悲壮。而于金泽荣而言，国家主权沦丧的现实使其汉诗在抒发对祖国的爱与忧之外，更将对国土沦陷的悲愤和无奈融于诗中，因而其诗在沉郁的同时更添凄怆之感。

艺术方面，含蓄蕴藉手法和律诗体裁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杜诗”的“沉郁顿挫”，梁启超和金泽荣的诗歌也都表现出类似特点。首先，二者都偏好虚实结合式的含蓄蕴藉手法，情与景的相映，虚与实的交错，都造成二者诗歌的“沉郁顿挫”之感。而于虚实结合之外，梁启超的旧体诗还多使用象征式含蓄蕴藉手法；而金泽荣汉诗的“沉郁顿挫”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典故的大量使用。其次，二人都偏爱律诗这一诗歌体裁，因律诗对语言的凝练性和意脉结构的起结转承都有严格要求，因而也使诗歌表现出“沉郁顿挫”的风格特点。

<参考文献>

- 김택영, 《김택영전집》, 서울: 아시아문화사, 1978.
 _____, 《소호당집》, 광주: 점필재, 2020.

- 金晋郁, 〈亡命後金澤榮의 世界觀研究: 漢詩作品을 中心으로〉, 《古詩歌研究》 제16호, 2005.
- 곽미선, 〈滄江 金澤榮과 중국 지식인들의 교류〉, 《비교한국학제》 제17권, 2009.
- _____, 〈김택영의 한시를 통해 본 망명 전후 의식세계의 변모〉, 《溯上古典研究》 제29집, 2009.
- 박수천, 〈滄江 金澤榮의 「雜言」에 나타난 神韻의 文學論〉, 《한국한시연구》 제25집, 2017.
- 정재철, 〈창강시에 있어서의 현실감과 우국시의 성격〉, 《한문학논집》, 1988.
- 황재문, 〈金澤榮 詩에 나타난 遺民意識〉, 《韓國漢詩研究》제13집, 2005.
- 康有为, 《康有为全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乔象钟, 《中国文学通史系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 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_____, 《中国历代文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梁启超, 《梁任公诗稿手迹》,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 _____, 《梁启超全集》,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_____, 《饮冰室诗话》,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 方东树, 《昭昧詹言》,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 邵瑞彭, 《周词订律考》,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杨伦, 《杜诗镜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叶嘉莹,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吴瞻泰, 《杜诗提要》, 安徽: 黄山书社, 2015.
- 王英志, 《清人诗论研究》,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
- 汪辟疆, 《汪辟疆说近代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汪松涛, 《梁启超诗词全注》,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袁枚, 《随园诗话》,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李庆甲, 《瀛奎律髓汇评》,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中山大中文系,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 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许学巧, 《诗源辨体》,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 黄裳, 〈演山集〉, 《影印文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金启华, 〈论杜诗的艺术风格〉, 《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 1978.
- 王辉斌, 〈杜诗“沉郁顿挫”辨识〉, 《杜甫研究学刊》第1期, 2009.

<Abstract>

Liang Qichao's old style poems and Kim Taek-young's Chinese poems were influenced by Du Fu's poetry in both content and art, so their poems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pression and frustration". In terms of content, the strong emo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Du Fu's poetry's "depression and frustration". Liang Qichao and Kim Taek-young also wrote their poems about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in exile, so their poems both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pression". The difference is that Liang Qichao's poems add a more tragic color to the "depression" foundation. For Kim Taek-young, the reality of the country's demise makes his poems more melancholy. In art, the use of implicit rhetoric and the poetic style of rhythm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Du Fu's poetry's "depression and frustration". The poems of Liang Qichao and Kim Taek-young also show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First of all, they both like to use the implicit rhetorical technique of combining false with true. Liang Qichao's old style poems also use symbolic implicit rhetoric

techniques. Kim Taek-young's "depression and frustration" of Chinese poetry is also due to the extensive use of allusions. Secondly, Liang Qichao and Kim Taek-young both prefer metrical poetry.

Key Words : 梁启超(Liang Qichao), 金泽荣(Kim Taek-young), 旧体诗(old style poems), 汉诗(Chinese poems), “沉郁顿挫”(depression and frustration)

